

（二〇一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 7 2 7 事件（一）	胡鹏池·但 粦
【各抒己见】	对钱理群教授“文革”观的异议	小 鹰
【拒绝遗忘】	我心中的那道伤痕	北 虹
【亡灵祭坛】	校园“劳改队”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	王友琴
【春秋史笔】	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	赵越胜
【千秋功罪】	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潘 鹭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 7 2 7 事件（一）

· 胡鹏池·但 粦·

◇ 毛如何策划“清华 7 2 7 行动”？

毛泽东的作息习惯一般是凌晨睡觉，午后起床。然而，1968年7月24日这一天却与往常有点不一样，可能在上午9点左右就已经起床了。这些日子来，面对着严峻的武斗形势，老人家有心思啊！

毛确实是一个有无比宏大抱负的政治家，这辈子几乎从未有过“倦政、厌政”的时候。说起来“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其实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小权”就演变为“大权”了；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毛每天都会处理大量工作，批阅大量文件，时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每隔几天就会来上一段“最新最高指示”；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来上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毛如果在耄耋之年真能放下心来外出游山玩水，该多么多么地好啊！大家都好。

7月24日这天，他做了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情：

- 1.批示“照办”《七二四布告》；
- 2.开始亲自策划“清华 7 2 7 行动”。

一、7月24日上午10点前，毛审阅《七二四布告》

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拳是打不死的。“制止武斗”也需要连续的重拳出击。

《七三布告》颁发后，广西武斗不但没有制止，相反加剧了。陕西也一样，出现了专业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这些坏消息雪片般地飞来，于是毛授意中央再发一个针对陕西的布告。

7月24日一早，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稿，批示“照办”。这个“布告”于当日发出，史称《七二四布告》。

《七二四布告》规定如下：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后来，毛在“728谈话”中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所说“再发一个全国性布告”，后来没有做。因为“清华727行动”和“728谈话”已经起到了并超过了“全国性布告”的作用。

二、7月24日上午10点，毛对谢静宜面授机宜

我们猜测毛审阅批准《七二四布告》的工作上午10点前就完成了。也许在他将稿子交给工作人员去具体办理后坐在大沙发上喝茶、抽雪茄时，仍然心事重重、放心不下。他或许想“七二四布告”会不会也落下“七三布告”一样的结果？而对于眼皮子底下的北京高校武斗，尤其是愈演愈烈的清华、北大武斗又该如何下措施？如果仍然采用一般的办法，显然是不能快速见效的；如果派军队去“三支两军”，军队有“五不政策”，革命哪能这样文质彬彬？

有没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办法呢？

暮然之间他想出一个新主意：派大批的工人、农民去学校，用人海战术包围那些武斗的学生，捅他们的“马蜂窝”，效果会怎么样呢？

再往深处想一想，觉得这个新主意不失为是“妙计”，可起到“迅雷不及掩耳”与“泰山压顶”的奇效。

毛泽东在房间内踱来踱去，越想越兴奋，眼前仿佛出现了工人进驻清华日，师生们“箪食壶浆”的场面。

派谁去实施这一“妙计”呢？“妙计”之所以“妙”，就在于要让所有的人都想不到，所以也需要用所有人也想不到的“奇兵”。

蓦然间他想到了小谢与迟群两个“小人儿”。于是立刻让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找小谢同志来面授“锦囊妙计”。

“小谢”即谢静宜同志，河南人，是年33，面容姣好，口齿伶俐。她从1959年起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一个有应变能力、会“动脑壳”（湖南话）的女娃子。几个月前，这个小谢同志被派往“新华印刷厂”去搞“三支两军”，并在刚成立新华厂革委会中担任要职。

说是“灵机一动”，其实也不是凭空“拍脑壳”，仍然是有来历的。

“妙计”的来源也许与“清华414”的简报有关。前文我们已经披露414有一个简报组，经常用“简报”的形式，向中央、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反映清华情况，呼吁中央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这个“简报组”是由414总部委员尹尊声同学负责的。7月26日还给一些“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汇报与建议”，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其内容与毛泽东的决定不谋而合。

事实上从7月初以来，清华园武斗进一步迅速升级。蒯大富一派所组织的武斗队伍装备精良，拥有30多支各式枪支及大量的手榴弹、地雷等，凭籍武器优势已经用“铁血”手段严密地封锁了414的老巢——科学馆的一切进出口，接连三天真刀真枪开枪射杀3名414派的人员，又放“燃烧弹”烧毁了科学馆顶层。科学馆内100多名414人员和若干名团派俘虏的生命危在旦夕。团派面对大好形势，信心爆棚，认为攻陷科学馆指日可待。而414方面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不断有人向毛泽东及党中央反映情况，提出过这类大同小异的建议。

有一位参加414的老师叫傅正泰，是414总部委员，他也曾给毛泽东拍过这样的电报。2015年6月4日下午，本书两作者在拜访他时，已经80多岁的傅老师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68年7月中旬，在死了人后，我就去上访，没人理我。我到电报大楼打电报给毛主席、中央，说：依靠学生主导文化大革命已经不行了，要让工人阶级出来主导文革。”

当这样一些“十万火急”的简报与电报放在书案上时，只要毛泽东偶然之间的惊鸿一瞥，“灵感”就产生了。

“奇兵”的来源也与报告有关。不久前，谢静宜与迟群（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被派到新华印刷厂搞军管，他们搞出了一个《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毛看了后非常满意，并于5月19日批示说：“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中央于5月25日将此件批转全国。

迟群之所以能在文革中崭露头角，以一介匹夫被老人家看中，提拔于行伍之间，其最初的原因即来自于这份极左的报告，迎合了老人家自己的极左思想。

由此，毛认为谢、迟这两个小家伙搞得不错，这次就用他们作“奇兵”去实施自己的“妙计”。

上午10点左右，谢静宜接到吴旭君电话，一刻也不敢耽搁，放下电话就回去见毛泽东。毛向她面授机宜，要点如下：

1、关于形势：

毛泽东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们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

2、关于任务：

毛泽东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3、注意事项：

1. 行动要快：毛泽东交代小谢：“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2.注意保密：毛泽东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3.警惕流血：毛泽东还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谢静宜的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毛的精神状态。她说：“主席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

当然啦，毛之所以精神振奋，说明了对这一策划的得意与自信。

这就是震撼世界、彪炳历史的“清华727事件”的最初由来。

三、谢静宜如何传达毛的指示？

毛泽东急急如火，谢静宜事不宜迟。虽然已到了吃中饭的时间了，但既有老人家明令在先，小谢连中饭也没敢在中南海吃就赶紧回到新华印刷厂，立即将毛的指示向相关人员作传达。

第一时间：24日中午，向在新华印刷厂支左的8341部队副团长、时任厂军管会主任的张荣温同志以及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时任新华印刷厂军代表、革委会主任的迟群同时作了传达。

第二时间：下午，谢与张、迟一起回 8 3 4 1 部队向团长杨德中传达。

第三时间：下午，杨德中带着张、迟、谢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传达，汪表示大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并要求他们立即去向北京市委传达。

第四时间：当日下午或晚上，杨德中带着张、迟、谢三人向北京市委传达，听取传达的有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及北京卫戍区有关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人。

四、北京市委与工宣队如何落实毛指示？

当年落实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即使在半夜里传来消息，也会敲锣打鼓地满世界地去游行。散兵游勇们没有锣鼓，敲敲洗脸盆、洗脚盆、饭盆、搪瓷茶杯也都行。这样的游戏，笔者也曾参加过不止一回。当年就不一定很虔诚，现在想想真是笑死人了！

所以，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在听到谢静宜的传达后立刻闻风而动，随即进行一系列的落实与布置。他们做了如下几件事：

1、确定首选目标。北京市委与杨德中等人商量结果是先进清华。大家一致认为“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征求毛的意见，毛也说好。

2、7月25日—26日，张、迟、谢等与北京市委及卫戍区有关领导会同下属有关单位确定参加行动的单位名单，一一打电话通知于26日晚在新华印刷厂开会。

五、北京市委及工宣队如何落实毛的“保密”指示？

毛泽东对谢静宜面授的机宜中有一条：“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我们将其称之为毛泽东的“保密指示”。

毛一生的习惯都十分重视保密，认为“保密”是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既然毛如此重视保密，那么市委及工宣队领导当然会更重视，他们围绕着这条指示作了一系列部署。

1、按照毛的要求精心挑选参加工宣队的工厂单位。

7月25日，在市革委工交口、支左办的帮助下，联络了大联合、三结合搞得比较好的61家工厂组成共约两万八、九千的产业工人、农民的队伍。（以后统称3万人）

2、由市革委会亲自部署迷魂阵。

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

25、26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不断地组织一些工厂的工人专门去清华大学附近游行，呼口号，造声势。大多数情况连校门都不进，只在周围呼口号，但也有一次进了校门，一度到达清华毛主席塑像（即二校门）附近。

3、甚至到了27日上午，工宣队还在继续摆迷魂阵：

“（27日上午工宣队）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

看来，谢静宜对毛的“保密”指示，以及如何落实的印象很深刻，在书中“制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前一节就是“毛主席很注意保密工作”。

在蒯大富、韩爱晶先后出狱后，谢静宜曾三次见过蒯大富，一次见过韩爱晶。蒯韩都有可能向她提出“727行动”究竟是谁策划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她的明确答复。谢静宜心中明白，毛泽东的“保密指示”正是“727事件”的关键所在，所以她也一直保密至今。也许她正是想利用新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作回复，也向历史作个交待。

六、7月26日晚，61个工厂负责人在新华厂开会

7月26日下午2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大手一挥，指着清华平面图，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

参加这次会的应该包括张荣温、迟群、谢静宜等人。

所以，参加“727行动”的8341部队的指战员们全都知道这一行动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这与后文中的有关情节相呼应。

7月26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由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召集有61个工厂单位参加的工厂领导人会议。

张、迟、谢等刚刚参加了毛泽东的会，又带着毛的具体指示赶来参加了这个会。

在这个会议上，为了落实毛泽东的“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指示，市委决定由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代表参加，随即发出通知。

会上，将宣传队分为8个团，对每个团进行了分工。显然，这是一个“分片包干”的方案，而不是“层层推进”的方案。工宣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采取“分片包干”是合理的。

市委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温玉成等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研究，布置行动方案。此外还有直接参加行动指挥小组的市委副书记、卫戍区政委刘绍文、还有市委支左办公室的同志。

会议一直开到26日晚11点多，当各项工作安排就绪后又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作了汇报。但是并没有散会，与会者需要等待汇报的结果，就地休息，往单位打电话，预作布置等等。新华印刷厂为他们准备了免费夜宵，也不收粮票。

七、7月27日凌晨2点，毛批准“727行动”

在得到新华厂会议情况汇报后，周恩来认为还有必要再作一次汇报。于是周立即与毛住处联系，在得知毛尚未休息后，周恩来就夹着公文包要去汇报。

可就在此刻，江青却从卫生间或休息室跑出来说她要去。

遇上这种情况，周当然不会与江青争。周既没有说“谁去都一样”，也没有说“我们一齐去”，就让江青一人去了，自己坐在会议室干等。江青请示汇报了什么内容？历史没有记载。历史不负责记载老夫老妻私房话，只记载了江青这一去将近两小时，回来后也只是说毛同意了。

江青回来再转达给周恩来，周随即再向新华厂会议的负责人转达。负责人再向与会人员传达。

这样一来一去一耽搁，新华厂会议开至27日凌晨两点左右才结束。各单位负责人就回单位去组织、布置了。他们需要落实的事情太多了，人数、分组、汽车、干粮、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标语等其它宣传品。因为事情突然而急促，食堂来不及给工人准备馒头与花卷，许多单位给工人们准备的干粮是临时采购的面包、粉肠，还有北冰洋汽水。

对于他们而言，今夜无人入眠。

中南海那边，江青走后，毛泽东洗洗睡了。

请读者诸君注意，这时是27日的凌晨一点多钟，毛泽东才开始睡。真是很辛苦！

而周恩来呢？他还捞不上睡。

当时间过去了整整24个小时，又是一个凌晨一点多钟，已经睡下了的毛泽东却被周恩来的电话吵醒了，刚听了电话另一头周恩来的几句汇报，毛泽东惊道：“造反派，真的反了！”

（未完待续）

~~~~~

【各抒己见】

对钱理群教授“文革”观的异议

• 小 鹰 •

最近，北大的钱理群教授，通过对清华文革十年的梳理，撰文讨论了“文革时期群众政治与国家、政党高层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群众政治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记忆》，170期）阅读该文对于理解一个极权国家中所谓的“民主”，以及如何认识群众运动中的“民众”本身，都很有教益。

如果进一步跳出“文革”的圈子来广义地思考所谓的“群众政治”，那么，清华文革的实例，对于研究群体政治行为，政客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包括对比中西方国家有关政治诉求、利益冲突、伦理道德、社会公益的公投与选举、抗议与示威等活动，均有启示；对于了

解某些群众团体与宗教组织在信仰心理、崇拜思维上的短视盲从、急功近利、狂热极端等弊病，亦不无借鉴之处。

钱教授虽然提出了“群众政治”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

然而，遗憾的是，从文章一开始立论，钱教授就把“文革”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角斗，文中谈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总是以“官僚政治”一言以蔽之。这不免歪曲了“文革”斗争的实质。虽然这种错误的基调并不影响钱文对“群众政治”的许多分析和结论，但搞清楚“文革”的本质，却可以解决令“造反派”分化的“两个毛泽东”之“悖论”，从而把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引向深入。

鉴于目前学界广泛流行“文革”是一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运动的说法，笔者想就这种“文革”观作些商榷。

钱教授这样论述文革初毛、刘在清华的“角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的模式和官僚政治的模式。”

我以为，这种说法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好像刘少奇派了工作组，要抓“右派”，便是维护“以‘组织、领导、纪律、专政’为核心的官僚政治”，而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倒刘，却是要反这旧有的“官僚政治”。似乎其好心仍是要寻求对“官僚政治”的“变革”，尽管他最终是要以“独裁政治”取而代之。

“独裁政治”对“官僚政治”——难道这就是“文革”的矛盾所在吗？

钱教授的文章割断了文革与十七年路线斗争的历史缘由，只看在“清华文革”那一段时期的现象，仅根据是“派工作组”还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点，就对毛、刘下断言，以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毛泽东定意打倒“走资派”刘少奇，是他发动文革“蓄意以久”的原因；而他在派“工作组”一事上大作文章，不过是个借口和煽情的手段。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在毛泽东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煽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毛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元梓和蒯大富这两块石头来打人，在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示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帐和老帐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因此，如果单看毛、刘在“派工作组”一事上所谓的“角斗”，那是只看表面现象，“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也就是说，钱先生至今还停留在66年8月的思维里，仍然入了毛先生的“彀”，着了毛的“道儿”。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走资派”，而刘少奇一派，和“四清”时一样，根本就不赞成有“党内走资派”一说，于是，刘派搞了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二月提纲”，来抵制毛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化革命”。

不错，是刘少奇主持通过了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但故意让刘来主持旨在打倒他自己的纲领，正是善用“欲擒故纵”和“引蛇出洞”之计的毛泽东给他“下圈套”的开始。而刘在会上也不是没有争议，他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陈坡，《文革沉思录》之二十三）。但中共党内历来实行“家长制”，一切由毛“乾纲独断”，少有民主。刘必须服从“组织和领导”，一步步走向毛为他设计好的“陷阱”。

事实上，刘少奇并不想搞什么“文革”，更谈不上有什么自己对文革的“理念与设计”。但那时无从清楚毛泽东到底要干什么，刘少奇更没有料到毛“文革”旨在打倒他自己。你毛皇帝又要搞“运动”吗？那就和以往一样，再派“工作组”来领导吧！有人要“反党”？那就按你老毛57年的办法，抓“右派”。

1966年8月4日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董必武副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董是个老实人，他的老实话代表了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恐怕也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想法。

况且，派“工作组”一事，事先也是按组织纪律“请奏允准”过的，现在你老毛又出来做脸，故作惊讶，大表痛心，令蒯大富等“造反派”棋子“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地成为打手，以死相随。这等“一石二鸟”的暗算，如此低劣无耻的演技，难道钱教授现在看了也还动情吗？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说，刘派对毛牵头“文革”一事，是从“消极抵制”、“阳奉阴违”或“想不清楚”，到跟着“揣摩”或“应付”，完全谈不上是“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或“两种模式”的“角斗”。

钱教授提出了所谓“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斗争的说法，试图以此来解释文革现象。虽然他也提到“群众政治”，但正如他所说，那只是毛派的附庸或工具，因为在拿掉刘派之后，“造反派”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亡了。

然而，钱教授这里说的种种“政治”，都是些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概念”，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政治”，“政治”，“政治”究竟在哪里？“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内涵到底有什么质的不同？不问建国以来在路线、方针上的斗争，这样空谈形式上的“独裁”对“官僚”，一点“政治”内容都没有！“独裁”就不依靠“官僚”啦？“四人帮”又是不是“官僚”呢？毛泽东骂刘少奇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那1976年四月五日的血洗天安门广场，毛干的是不是“镇压”？是不是“恐怖”？这个恐怖又是不是“来自中央”呢？

钱教授承认：“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政治模式，不过是一党专政的不同形式。在维护一党专政的这一根本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分歧。”

很好，既然“并无分歧”，那我们又绕回到原来的问题：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把刘少奇往死里整？文革中毛泽东曾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钱教授能不能讲清楚，自建国以来，毛、刘有没有过重大的“政治”分歧？如果没有，后来怎么会走到“不共戴天”的地步？

钱教授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图以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一次大实验。”但毛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大实验”呢？也有人说，毛把刘派搞掉，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搞掉”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答案应当说，还是二人政治路线、治国理念的对立，且这“对立”的程度已是“水火不相容”了，才要“大动干戈”。什么是“政治”？“政治”者，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是也，是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也。“专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役政”。

有人健忘，不得不旧事重提。

自六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处处受人抵制，说话已没有人听。在他看来，中宣部是个和他作对的“阎王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部，还有那个“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连身边一个北京市委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阻挠他的“大批判”，整个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指控，农村里在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城里推行的是“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讲“合二而一”，文艺上提倡“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因而毛泽东确信，刘少奇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毛岂容党内有两个发号不同命令的“司令部”？所以他才要“清君侧”。“清君侧”清的就是“异己者”和“绊脚石”，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

钱教授割裂文革与17年历史的关系，不探求“异己”异在哪里？不追究“绊脚”绊在何处？这样不谈“路线斗争”，不问“是非对错”，只纠缠在“官僚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形式之争，又怎么能搞清楚“文革是什么？”、“文革从何而来？”等问题呢？难道上述毛泽东的那些指控，都是旨在“反‘官僚政治’”吗？

不错，刘少奇是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不过……彭德怀也没有，而且，如钱教授所指出的，在毛、刘“影响下的两派的主流（即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一党专政（党的绝对领导）本身也并无怀疑”，“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刘少奇那时要是公开反对了，毛就不用称他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不用搞什么“文化大革命”，直接送进“秦城”就好了；而任何“造反派”胆敢这样想，也立刻会被同类“砸烂狗头”，扭送“专政机关”。现在有人却以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来指斥刘少奇，来为“文革反官僚”说做铺垫，替毛倒刘说项，或为自己当年追随毛“造反”倒刘寻得某种“安慰”，实在不高明！研究文革，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毛、刘建国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何在？看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路，总得一步步走，要求刘少奇“走资”，就须“一步到位”，废除“一党专政”，否则就“哈，你也不怎么样！”如此脱离当时实际的社会状况，强求前人是应该的。

可是现在不少人就是指责刘少奇“不反体制”——而这背后的“潜台词”便是：你不能反驳吗？所以我说毛、刘都一样，甚至毛比刘还强些，毛至少还不满这“官僚体制”，反了“官僚体制”。他失败了，虽败犹荣，还是个和百姓同在的“英雄”。这就是秦晖教授所说“但刘（少奇）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的意思。也正是由此，他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歪曲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难道秦教授就真的不明白，我们上面说的那些事，谁“左”谁右吗？

看来，在当年自己“奉旨造反”的人的眼里，只要刘少奇不“反体制”便算不得好汉！因此，我造你刘少奇的反，就是造了“官僚”的反。这逻辑是多么地“顺理成章”啊！

但是，如果一定要用“反体制”这个词，那我认为，刘在1951年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他敢讲“资本家‘剥削有功’”，敢有批示“反对农业合作化”，且指出“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反体制”，即反对毛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或“体制”。这是毛、刘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当然，你可以说，刘最终也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是的，他不是华盛顿。但如果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毛泽东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也正在于此。刘少奇若能这样想、这样做，至少是开了条路吧？如果刘走不到底，党内还可能有的类似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开明领袖啊！

可是，当年又有哪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怀疑过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呢？有谁曾想到过在生产落后、封建专制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吗？甚至那怕只是稍微考虑一下“不破坏私有制”等大胆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很少，多数只是狂热地齐声唤：“红太阳”打倒刘少奇！所以难怪到现在还看不出毛、刘的差别在哪里！……而现在又如何呢？我们且不说海外的公知，就说钱、秦二教授吧，他们无疑都是改革派，都愿意中国繁荣又民主，但他们二位公然宣称过“反体制”了吗？他们高喊“打倒共产党”了吗？我想也未必。彭德怀和张闻天，胡耀邦和赵紫阳又算不算是“反体制”人物呢？现在主张实行“宪政”，主张“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的人呢？……看来，从刘少奇到胡耀邦的时代，以至到现在，企望要有个政党来代替共产党，掌管全中国，恐怕还不现实。党内外的那些明智改革派的斗争才是希望，如果把他们一概斥之为“拼命维护体制”的旧官僚，是不是有点太“左”了？

总之，把文革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说成是“独裁”对“官僚”的关系，对毛、刘各打五十大板，貌似非常公平和彻底。其实，“独裁”又怎么样？毛泽东历来承认，毛自己就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官僚”则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如此一来，在一般人听来，毛反倒比刘还好一点，似乎毛有“正气”，一副“帝王相”，他痛恨“官僚”，出发点还是个“善”字；相比之下，按他们所说，刘像是个“猥琐不堪”和“祸国殃民”的佞臣贼子，形同“过街老鼠”，令“神厌鬼憎”，其中的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可怜，某些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到现在还在替毛打工效力，拼命把“反官僚”的桂冠戴到毛泽东和自己的头上。

还是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当年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戚本禹“讨刘檄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路线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文革中它“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怎么现在这些刘少奇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情都没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争斗，谁是谁非？总得有个说法啊！难道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了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不通啊！

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

这种“逻辑混乱”的根源在于，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进而他恐吓人们：你们瞧，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做官当老爷”，叫你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现在许多贪官“认罪检讨”时，也总是说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被“资产阶级”腐化了。

其实，他们干的事，自古以来，还没有“资产阶级”时就有了，是“封建特权”。“贪腐奸淫”的事，无需“资产阶级”来教化，有特权就可以做。而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反的就是这“封建专制和特权”。

然而，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走资派”就是“反官僚”，“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而且，这种“概念偷换”不可避免地又导致了一个“悖论”，那就是让许多人抓狂的两个毛泽东：十七年打造“官僚政治”并“主导红线”的毛泽东，和文革伊始带领“造反有理”且“继续革命”的毛泽东。

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造反派”因此曾分裂为两派，“团派”强调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414派”则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不容否定，更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匪夷所思”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清华的团、四两派，以至全国众多“造反派”之间，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其实，这“悖论”之解在于：建国之后，只有一个毛泽东，一个刘少奇，他们背后有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也就是说，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彻底解决“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我接受他本人的说法，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

([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一文里，我论述了为何不但应当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而且连他前十七年所谓的“主导红线”，也是一条反历史规律而动的路线。因而，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毫无意义，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

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刘少奇语），尽管他们的初衷刚好相反。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2016年12月29日，2017年4月修改

## 【拒绝遗忘】

### 我心中的那道伤痕

· 北 虹 ·

1966年6月初的北京，天空特别蓝，阳光特别灿烂，短暂的春风没吹几天就一步跨入了夏季。离放假不到一个月了，本应该进入总复习迎接期末考试，我们却越来越没心思学习。蓝天骄阳下，一种莫名的热度在不断升腾，躁动的校园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学校的大喇叭里不断播出一些中央通知和激动人心的宣讲，有的听不清，有的不理解，好像都是批判性的。记得还有我校初三的一位姓宫的同学的文章：《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直指当时的考试和教育制度，让我们听了既惊讶又佩服。我作为中学校园里最低年级的初一学生，没啥自主意识，上边有五届比我们大的学生呢，跟着他们行动就是了。

记不清是哪一天，大喇叭里突然响起“打倒陆平”、“打倒刘美德”的呼喊，陆平是谁我不清楚，而刘美德，她可是我们北大附中的副校长（正校长是由北京大学的领导兼任的）啊！既然她都要被打倒，老师们更不在话下了。不少班级开始了对老师的批斗，开始只是限于嘴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学生动手打人。最有趣的是，我们年级有个特有绘画天才的同学，画了张他们班主任的肖像贴在班级的门上，那叫一个像！吸引了不少同学围观，而挨批的老师反倒没人留意了。后来学校里越来越自由，没有了上下课的铃声，没有了考试分数的压力，没有了老师和辅导员的管束。在大喇叭的召唤下，我们这些住宿的学生便结伴走出校门，群情激昂地去相距不远的北大校园看大字报了。

8月，烈日高照，运动升温。无政府状态下的校园里，同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校学生“牛宫彭”率先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自创的革命造反歌也迅速唱响了全市的各个中学。一年来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学们，迅速地按各自出身的不同结伴活动了。一天，班上那些革干、革军出身的同学被通知去天安门广场参加

重要活动，我们这些没资格去的女生聚在学校宿舍里闲聊。大家对被排斥在活动之外都有些不服气，其中一个姓Z的女同学说：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好多革命家的出身都不好，总理也是的。大家听了一致赞同，认为他们这种唯成分论的做法不对。

其实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那一天有多么的重要！那一天是8月18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参加人数达百万。这个大会，以后被称为“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各个中学的红卫兵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还对红卫兵代表宋彬彬说：“要武嘛”。这一天不仅载入了史册，也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行动的开始。

那天之后，学校里的气氛变得愈来愈紧张，红色同学们忙忙碌碌，我们这些入了另册的学生呆在宿舍里无所事事，又不敢回家，怕受到“不革命”的指责。一天下午，几个同学来到宿舍通知我，马上到教室里去开会。开会？我有开会的资格了？但看看她们的脸色阴沉，又觉得不像。怀着几分忐忑，随着她们匆匆走下了宿舍楼，走到初中楼，走进了教室。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对，桌椅全被堆到了教室后边，教室中间留出了空地，当中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些同学三三两两靠墙而立。

这时有人走过来大声呵斥：“北虹！你为什么攻击周总理？”我立刻想到前两天宿舍里的闲聊——其实周总理的出身是什么我以前并不知道，那天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我不服气地说，不是我说的，再说也不是“攻击”，周总理的出身是不好。突然，有人不由分说抡起带铜扣的军用皮带就抽了我一下，还骂“反革命狗崽子”之类的话。性格倔强的我大声说：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凭什么打人？他们说，打的就是你！狗崽子！又是一皮带抽了过来，打在我头上，血立刻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热乎乎的。接着他们又拿来一碗墨汁用刷子刷在我的脸上，然后叫我站到桌子上继续抽打和辱骂。有人把桌子踢翻了，我摔下来！他们命令我再站到椅子上……这时我脑子蒙了，不再争辩，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我没有做错什么呀？为什么这样整我？

折腾了一阵子后，乘他们稍有松懈，我跳下椅子猛地推开围观的人冲出了教室，可能是那些打人的没想到我竟会如此的勇猛，要不就是初次打自己的同学，他们还有些胆怯和缺乏经验，一时来不及阻拦。我冲出了楼道，冲出初中楼大门。迎面走来几个同学，看到我的表情都是一脸的愕然，我想自己满脸墨黑夹杂着鲜血，一定吓到他们了。我一路飞奔，穿过小操场，跑到了高中楼。我下意识的直觉以为：那里有新成立的革委会，那里有红卫兵的领导，他们一定会制止这种乱打人的错误行为的！

跑进一楼，我一头冲进了女厕所，想先洗净脸上的血迹和墨汁。这时后面传来一阵喧哗，我慌了，连忙躲进一个厕位并插上了门闩。接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涌进来。不一会儿，喧哗中有一个平和的声音：“那个同学你出来！我是彭××，有什么话你出来说”。彭××？她在“八一八”那天上了天安门城楼！回来后担任了校革委会的主任！她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啊！我立刻打开门走了出来。张口正要告状，不料她抬起手就打了我两个耳光！口中还狠狠地骂着“狗崽子”！我当时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捂着脸喊：彭××，你受过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你怎么能带头打人？不知是因为当着那么多围观的人不好继续发作，还是想到了自己的校领导身份，她没有再打了。让我先去水池洗脸，然后叫几个人把我押到了高中部楼上，他们打开一间黑乎乎的屋子，把我推了进去。

等我眼睛适应了屋内的光线之后，才发现黑屋里面已经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高年级同学在地上半躺半坐着，他们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神情黯淡，想来也和我的遭遇一样。我没有流眼泪，也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蹲在了墙边。记不清当时屋里究竟关了几个人，过了很久才

得知，其中有个高三的男生叫朱彤，他是有名的大右派葛佩琦的儿子，虽然他妈妈和葛佩琦离了婚，他也随了母亲改姓朱，但是仍然摆脱不了“狗崽子”的身份。由此推断，这次打人是全校有组织的镇压“狗崽子”的行动，也是“八一八”后红卫兵的初试牛刀。从那以后，开了杀戒的红卫兵挥动起皮带来就不再像这天这么“仁慈”了，所到之处必是一片血光之灾。

后来我被放出了黑屋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楼。可是我已经不能住进原来6人一室的房间了，我的被褥被扔到了楼梯口玻璃门外不足两平米的阳台上，我在阳台上度过了几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子全淋湿了。这时的我，再也没有起初的不服和抗争了。我终于明白了，因为我爸爸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我就得背负“狗崽子”的罪名，承受辱骂和皮带的抽打，这就是我的原罪！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50年前在教室里用皮带抽打我的是谁，不记得那些围观、斥责、辱骂我的都有谁，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被褥扔到了阳台上……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我曾经的同班同学，他们是否还记得这些事情？他们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否会有一丝的愧疚？

（2016年5月18日）

□ 原载《熊窝》网站

~~~~~

【亡灵祭坛】

校园“劳改队”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

• 王友琴 •

吴兴华，男，北京大学英语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文革中被划入“劳改队”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殴打和抄家。

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被说成是“装死”。当天夜里去世。红卫兵坚持说他是自杀对抗文革，不顾吴的妻子反对，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

吴兴华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同学郭蕊，曾经在文革之后的1986年发表一篇题为《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吴兴华的家世，早年的聪慧，大学时代的友情，后来的写作和翻译等等，相当细致生动，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才华有造诣的学者形象。但是，对于他在文革中的死，却含糊其词，令外人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也没有提到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

这样的写法显然是当时出版审查所要求的。这种写法是当时的通例。凡是发表的描写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文章都用这样的写法。当局一直对如何描写文革有严格的控制。在八十年代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文章中，都主要写死难者生前是一个好人（当然在什么是“好人”方面有一些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提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起了给死者“平反”的作用，比起文革时代把他们当成“阶级敌人”迫害和杀害，这当然是极其大的进步。而不

准提他们的死亡经过，是为了掩盖文革的历史以避免深究文革领导者的责任与产生文革的根源，也很明显。

吴兴华的才华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

吴兴华原为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1952年北京大学从市内搬到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吞并了燕京大学。吴兴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系主任。1957年，吴兴华被打成“右派份子”，降了两级。五年以后，1962年他被摘了“帽子”，仍在西语系工作。四年以后，文革开始了。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起源地。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领导开展对大学原领导人和教师的攻击。全国学校停课，以北京大学为样板进行文革。

工作组很快就制定了打击对象，并用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和召开斗争会的方式推进文革。6月11日，历史系副教授汪篪在学生和工作组的“斗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也是同事还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声音。两年以后，1968年6月24日，化学系的老师卢锡锬自杀，也是服毒，死后人们看到他一定是由于非常痛苦，用刀把自己的手臂砍烂了。

这样恐怖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同情和善心。1966年6月18日，未向工作组报告，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校工就用暴力“斗争”已经被“揪出”的几十个干部和教员。高帽子，下跪，都被使用了。中文系的学生把厕所的大便纸篓扣在系领导人程贤策和向景洁头上，把他们打得满身青紫。有人把一根绳子套在生物系讲师胡寿文的脖子上，拉倒在地，拖了就走。胡被勒得几乎不能呼吸。他尽力用手拉住绳子套，才免于窒息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当晚北京大学工作组开始反对这样的行动。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维护工作组的绝对领导，而不是出于对法制和人道的考虑。随后，在北京主持领导文革的刘少奇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像北大工作组一样，制止“乱斗”。

“不乱”的“斗”继续大规模地进行，有序而无情。工作组对所有的教师和干部作了“排队”，把他们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宣布了一批“有问题的人”的名单，他们不被准许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系里的一般会议，（当时全天除了“学毛选”就是开会。）而被命令聚合在一起作体力劳动。这就是后来在全国每个学校都建立了的“劳改队”，又叫“专政队”或者“牛鬼蛇神队”的早期雏形。

董怀允，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被贴大字报和批判斗争，并被打入这样的雏形“劳改队”，不能忍受，在1966年7月28日自杀。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毛称北京大学6月18日的行动是“革命的”。毛下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人到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在大会主席台上用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对“牛鬼蛇神”的全面暴力迫害开始了。

工作组被撤，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掌权。一份在文革时代写下的“北大文革大事记”说：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得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另外，在聂元梓同志的倡议下，黑帮份子被革命师生员工揪了出来，实行监督劳动。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吴兴华被打入“劳改队”中。

1968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著名的“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当时还有来自各地的大量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学习革命经验”和进行“革命串连”。火车和公共汽车都不向红卫兵收票。每日到北京大学来的可能有上万人。一批“劳改队”中教师，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有他们的罪名和姓名，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大叉子，被强迫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门口拣拾垃圾。那里来往人多，随时会被打或被侮辱。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了头发，拎着一只破筐拣西瓜皮。每来一拨要“斗争”他的学生，他就站在一只反扣过来的水果筐子上，被强迫“自报罪行”，或者被打。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七八次。

“劳改队”里的“牛鬼蛇神”不能抗议这样的虐待。“劳改队”外也没有人试图制止这类行为。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一个外国人，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劝说红卫兵：“你们不要打他们。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没有人听他的。虽然人们都知道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是对“劳改队”中的人，惩罚是无边的，不用遵循任何法律。

在“劳改队”中的人也被抄家，被封房子，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字报。家里人也知道，吴兴华已经挨过红卫兵的打。

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又昏倒。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半夜，他的妻子被叫来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死了，死于急性痢疾。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吴兴华的尸体被解剖。

这种对死者的凶恶的手段不只是单独施用于吴兴华的。同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谢家荣被“斗争”后，写了遗书，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在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被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也是非常大的罪名。自杀死了的人还被诅咒是“死有

余辜，遗臭万年”，而且会株连家人。谢家荣的家人立即销毁了他的遗书，告诉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权力当局他是心脏病发作死去的。谢家荣还是被怀疑是自杀的，并被送上解剖台。医生剖开了尸体后，说他不是自杀的。但是那些人认定谢家荣是“牛鬼蛇神”，他的尸体被切开了，不容缝上，就被拉走火化。直到三十年后，谢家人才公布了真相，说出了那张被烧了的遗书。

自杀能变成罪名，解剖尸体不是为了医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自杀这一“罪名”。1966年夏天的杀戮，就是这样地穷凶极恶，不但整死了人，连尸体都不放过。

吴兴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写过和翻译过一些美丽的诗，他编写的英文教材也是极好的。他本来应该有平静而多产的学者的一生。可是他被打了，被侮辱了，被害死了。在他死后，他的尸体还被切开了。他死了三十年后，有人问他的家人，在他死后，他们有没有问是谁强迫他喝了沟里的污水，应该追查这样的坏人。他的家人说，那时候，是他们被逼问吴兴华是不是自杀的，而不是他们可以问问题。他们只能申辩无辜和乞求不要剖尸。那时候，红卫兵掌有生死大权，更掌有控制话语走向的大权。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6年8月24日，另一位英语教授俞大纲，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上吊自杀。中国最好最流行的英语教材，前面几册是许国璋写的，最后一册是她写的。1968年，吴兴华去世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徐月如和程远，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当吴兴华在“劳改队”被害死的时候，家属不能调查他是怎么被害的。他被害死去，他的身体在他死后还被切解。在吴兴华死后二十年时，关于他的悼念文章还不能写出他是被害的。他的死和死后的遭遇，都和文革竟然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希望在电脑网络上，关于他的死亡，能作一个真实的记载。

□ 原载《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

~~~~~

【春秋史笔】

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

• 赵越胜 •

林彪9·13事件45年了。45年来，有关9·13林彪叛逃，葬身蒙古温都尔汗的真相，至今未解，只因这里隐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林彪死于温都尔汗，是毛泽东以欲擒故纵之计逼林彪出走，又痛下杀手。中共至今隐瞒这一事实，但其实这个秘密已被邓小平打破。

问：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9·13事件给毛的文革敲响了丧钟。你今天的题目来解析这个问题，我想听众们会有兴趣。

答：关于林彪所乘飞机为什么会掉在温都尔汗沙漠中，有几种说法。官方只说“坠毁”，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说法，大致有几种：1.以导弹击落；2.油量不足迫降失败；3.机上发生搏斗，飞机失控坠毁。我们先说蒙古政府于1971年11月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事

实。蒙古政府当时和中共党内斗争毫无牵扯，所说应该是事实。首先，调查报告认定因驾驶员所犯驾驶错误导致飞机失事，而飞机完全正常，油量也足够，更不涉及导弹击落问题。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潘景寅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飞行员，曾经是毛本人的驾驶员，1967年7月，武汉百万雄师事件，毛仓促回京，就是坐的潘驾驶的飞机。潘那次是直接由周恩来指挥来执行抢救毛离开武汉的行动，想必潘给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因毛不再乘飞机外出，他就成了林彪的专职驾驶员。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买了三叉戟，就是由他亲自飞回中国。他的战友说他驾驶三叉戟像玩手中的玩具。但是这次他的飞行却犯了最低级的错误。蒙古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他是以600公里时速，在机翼右侧油箱带有2·5吨燃油的情况下，强行着陆，而且不是主动迫降，因为飞机减速的襟翼完全没有打开，飞机着陆灯也没有打开。飞机撞击地面时，引擎仍在高速运转。所以蒙古认为飞行员未进行安全迫降的准备。换句话说，飞行员是以自杀式的行为让飞机坠毁的。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方式。据当时未被叫醒一同上飞机的副驾驶康庭梓说，60年代，潘本人曾有过一次迫降经历，他极为镇静地反复盘旋飞行，直到燃油耗尽才迫降，相当成功，连飞机都未受大伤。可他这次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笨拙的方法着陆。只有一个答案，他蓄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置林彪一家于死地。

问：我们知道，潘在9·13日凌晨0点05分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接到这个电话后，才开始准备飞的。

答：对，这个电话是谁打的，谁命令他违反一切规范带林彪一家飞走的，这是关键的关键。谁打来这个电话本不难查清，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但中共对林彪事件有那么多材料。林彪死后，在军中查处了那么多人，几乎是像篦子一样梳了个遍，却从未有人去查这个电话。显然，打这个电话的人一查清，通话内容一公布，9·13事件就全清楚了。我们简略地把这个线索理一下。9月12日晚8时，林立果乘256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9时左右到林彪处，9点20分，林豆豆给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宏打电话，报告说偷听到林立果的话，说要带林彪去广州，还要轰炸中南海，害毛主席。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则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采取的措施是，1.中南海、钓鱼台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控工事、设钉板、断交通。2.让毛立即离开中南海搬到大会堂去住。我们知道大会堂有极严密的地下掩蔽所，号称能防原子弹，人称118。3.打电话给叶群，先问飞机，然后说要去北戴河看林彪。4.北京方面，让心腹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又让中央警卫局的杨德中去吴法宪那里，监视吴法宪。同时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256专机飞山海关的事。吴法宪自己回忆，他在晚11时左右接到周的电话，顿感事态严重，便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的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告诉他“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潘满口答应。等回过头来，吴又想向周汇报潘本人的表态时，周却告他飞机已经起飞了。吴大吃一惊。后来李作鹏一句话说明了：“如果命令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更何况在林豆豆报告了林立果要带林彪走，飞机就在机场了，这时不过晚9点，离林彪上飞机还有四个多小时。周一个命令封锁机场，林彪是插翅难逃。这一群人却干等着林彪上了飞机。这明摆着是要逼林彪走。周给叶群打电话，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就算林彪身经百战，深知兵不厌诈，那个神经兮兮的叶群和毛毛躁躁的林立果还不一惊就炸。可我们知道，以周恩来的天性，这天大的事，他绝不会独断专行，自行处理，必定是每个细节向毛汇报，等毛的指示。奇怪的是在这个惊天动地的行动中，偏偏没有毛的一点影子，一丝踪迹。这全然不符合毛永远料敌之先、运筹帷幄的形象。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机。毛要算计林彪是蓄谋已久，一直在找机会。

问：从许多材料看，特别是从林豆豆的揭发看，林立果只是想拉林彪去广州，实在不行就去香港，从未见他们讨论过去投苏的材料。

答：确实，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可能有些新设想。接着上面的话题。叶群接了周的电话后，决定马上走。周的这个打草惊蛇之计明显奏效。可林豆豆急了，去找张宏，说他们马上要走，你不是答应要保护首长的吗？可这时张宏态度大变，一副不理睬的样子，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明摆着是接到了命令，不许采取措施。林豆豆再逼他，他给北京挂了个电话，一边听话，一边点头，放下电话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中央要让林彪走，这个“中央”只能是毛。但毛要这么宽宏大量地“捉放曹”，他就不是毛了。他让林彪走，却要让他去赴死。这个任务要由潘景寅来完成。潘赤胆忠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受到林彪案牵连的那么多人，邓小平独独表扬他是个好人。我们知道邓小平这个人最是心思缜密，绝不放空言，这次他终于说出了潘带着林彪一家子坠机的秘密，虽然也是欲盖弥彰，拉上了另一个飞行员当幌子，又说是“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邓大人可是从来“实事求是”的啊！不知内情，他绝不会为一个带着林彪投敌叛国的人平反。还有两个事实，一是当晚10点左右，周还发过指示，一定要保护好林彪，但两个小时后，这个命令却没作用了，反而是中央要林豆豆上飞机，和林彪一起走。谁能撤掉周的命令？只能是毛。二是9月12日，毛突然坐火车回京，不直接进京而在丰台下车，下车就对来接他的吴忠说：“庐山会议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把吴忠吓坏了。这个六号简报就是要设国家主席的那份简报。这两个事儿可以说明，毛要对林彪下手了。

问：那么让潘景寅带林彪飞，这个神秘电话可能是谁打的呢？

答：潘本来已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不管是什么人下命令，飞机也不准起飞”。吴是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保证服从，所以让他改变主意带林彪飞的这个命令，只能来自比吴更高的人，那就是毛、周。可毛是不会直接给潘下命令的，他永远是借刀杀人，要杀林彪只能借周的手。周可怜啊，有林在，在毛面前还有个挡头儿。没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敌。他绝不会主动害林，但从逻辑上看，这个电话只能来自他，或一个能代表他的人。从潘后来采取的神风特攻队着陆方式看，周可能鼓励他为保卫毛主席英勇献身，依照周的性格，他甚至会向潘保证你牺牲后，你的家属会由我照料。潘在0点05分接了这个电话后就去准备飞行。他的同事回忆说：“他一直没把我们其余5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看起来潘先生是个宅心仁厚的人，明知这次有去无回，不愿再拉上人白死。我们再来看周恩来知道飞机坠毁的消息后的表现。先是如释重负，连连说“摔死了，摔死了”，我猜他这是因潘完成了任务而松了口气，然后去找毛汇报。可在9月21日，周开完会后，当只剩下纪登奎和他两人时，他突然大哭起来。纪登奎安慰他，他却摇头说：“你不懂，你不懂，事情还没完”。我猜这大哭中就有对潘景寅的悔意。因为他实际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属，否则就露了馅。到了10月10日，他接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据他的专机机组人员张瑞蔼回忆，周平日上飞机只和机组人员握手，问候一声。可这次，他显得紧张，反复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机过长江时，周突然问：“这是长江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呀？”机组人员反复解释，周还拿地图反复核实才放心。张说：“我飞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看周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这个事实极重要。有人从过敏学的角度分析过周的精神过敏，一个人只有接触过过敏源才会过敏。周的过敏源就是林彪事件。林葬身大漠完全是有人操纵的结果。林是被毛逼走的，并被安排“坠毁”。周是参与者。林会有如此下场，周又怎知自己不会？这个背后的黑手是毛，只有他能操纵林、周的命运。

□ 摘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千秋功罪】

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 潘 鹭 •

〔本文由潘鹭口述，舒云整理〕

2012年7月，父亲潘景寅冤死41年后，我专门到蒙古温都尔汗祭奠父亲，为父亲扫墓。这是母亲的遗愿，也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心愿。

一

我的父亲潘景寅是空军34师副政委、林彪专机飞行员。1971年9月13日驾驶载有林彪的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41年来，关于坠机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没有结论。

父亲热爱飞行。我们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姐姐叫潘鹭，我叫潘鹭，弟弟叫潘鹏，都与飞行有关。因为父亲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提升很快，从大队长、副团长升到团长、副师长，仍继续飞行。

直到父亲离开我们很久后，我们才慢慢知道，父亲是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员，给毛主席、宋庆龄等都开过专机。多年来，父亲执行了很多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全部圆满完成，没有出过任何飞行事故。

父亲曾三次为毛主席驾驶飞机。1967年7月20日，父亲驾驶的伊尔-18飞机从昆明被紧急调到武汉，由父亲担任机长，把毛主席送到上海。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父亲驾驶的这架飞机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藏。

父亲最后一次飞行是给林彪当飞行员，他只给林彪开过这一次三叉戟，不幸以身殉职。

二

1970年6、7月，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四架三叉戟，这是中国首次拥有大型运输机。

本来已下达调令，调父亲到空军机关工作，因为接了这批三叉戟，要培养飞行员，又把父亲留在西郊机场。父亲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父亲飞出来以后再教其他飞行员。256三叉戟是四架三叉戟中最好的一架，因为中央规定，毛主席不再坐飞机，所以这个一号专机就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由父亲任机长。

父亲常常说走就走，母亲担惊受怕，总怕他有个三长两短。父亲飞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对母亲说：“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几个发动机，不会那么巧都坏了，只要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就能降落。”此后母亲放心多了。

我们家住西郊机场家属区，以往小飞机声音小，三叉戟是大飞机，声音比较大。每逢三叉戟降落，母亲都能听到，就对我们说：“你父亲回来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去接父亲。

三叉戟改装好后，需要多次试飞。姐姐潘鹭因小儿麻痹在长春治疗，母亲几次催促父亲把她接回来。正好父亲申请到长春航线，“九一三事件”前一个星期，父亲去长春试航，顺

便把姐姐接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曾追查父亲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根本扯不到一起。

三叉戟刚到西郊机场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曾爬上去看过。我有幸看到过三叉戟的全貌：整个飞机都是通着的，当时还没有装修。我姐姐是第一个坐256三叉戟的客人，据她说：这架三叉戟改装后，机舱中间加装了门，里面还有供首长休息的床。

三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的路上，我的头一直在痛，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1929年1月出生，他从小没有母亲，跟着姑妈长大，是个苦孩子，14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年6月，后来编为四野的部队路过他老家，他把牛鞭子一扔，跟着部队走了。他一走不要紧，地主找我爷爷要牛，交不出牛来就灌辣椒水，爷爷差点儿死去。所以后来父亲对我爷爷很好，“文化大革命”中把我爷爷接到北京。母亲专门请了保姆，最后为我爷爷送了终。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聪明好学，年纪又轻，被选到空军一航校学飞行，毕业分配到空军34师任飞行员。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他一直没有谈对象。航校同学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红军，在南口驻训。得知房东有个女儿孙祥凝正在北京大学护校上学，就当红娘把她介绍给父亲。一见面，双方都满意。父亲长得很精神，身高一米八，姥姥、姥爷很满意。母亲长相也很出众，脾气又好，父亲更满意，一拍即合。这时父亲已经30岁了，大母亲8岁。北京大学护校也很支持，特批结婚，但要求在校期间不许生孩子。

母亲后来说：“谈什么恋爱呀，就没怎么见面。老潘老出差，我那时又经常上夜班，结婚后也一样。”

父亲老不在家。母亲是海淀医院的护士，老要上夜班，所以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南口的姥姥家长大的。我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少。父亲很少来看望我们，偶尔在家也从不多说一句话。姐姐潘鹭小时得了小儿麻痹，没钱坐车，都是姥姥一步步背着她进城看病。经过治疗本来已经好转，因为父亲走了，治疗没有能继续下去，至今姐姐仍站不起来。

四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日，父亲刚出差回来。他难得在家里过个星期日，母亲、老舅、姐姐和我包饺子。邻居给了半个瓜，父亲最爱吃瓜馅，母亲拌了两种馅，瓜馅舍不得给我们吃，专留给父亲。父亲是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听母亲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在家里也没有感到困难，只要他一回家，母亲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说他在空勤灶吃惯了。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母亲都舍不得给我们吃，她和我们吃大萝卜条子和白薯，把肉留到星期天给父亲吃。

父亲很忙，就是星期日，也不在家。没有飞行，他就在办公室看书练字，随时待命。这时来了三个电话，都是找父亲的，有紧急任务，可是潘副政委没在办公室。父亲此时在理发室理发，以后听100团政委安治梁叔叔说，父亲这时吃了三片安眠药，准备理发后抓紧时间睡一觉，没想到要立即执行任务。父亲回到家里，瓜馅饺子还正在煮。来不及吃了，父亲

二话不说提着旅行袋就出了门。专机飞行员都有个旅行袋，装着牙具、毛巾和拖鞋什么的，以备随时出发。

结婚的时候，组织上就告诉母亲，父亲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经常出差，你什么都不要问，也什么都不要知道。母亲一直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平时在家里，母亲很自觉，觉得部队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党员，还是躲远一点。父亲拿回来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母亲看也不看。甚至作为飞行员待遇发给父亲的巧克力和水果，母亲也自觉不吃。父亲说走就走，母亲也习惯了，从来不问，既不问父亲上哪里去，也不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这一次母亲也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以后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领着儿子在我家串门，以后追查，他们正好当了证人，说父亲临走确实什么也没说。

父亲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临出门，他说“今晚可能回来”。北戴河离北京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晚上7点40分，256专机飞往北戴河，随即降落在海军所属的山海关机场。后来母亲才知道，在父亲最后一次上飞机的那个夜里，父亲一直没睡，坐在机场调度室，烟灰缸里装满了烟灰。自从50年代周恩来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了飞机后，父亲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宁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证专机安全。

五

在母亲眼中，父亲不爱出风头，话也极少，从不跟什么人跑来跑去，有时间就钻研飞行技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父亲的性格，父亲有个侄子修沙河机场，想当兵。正好父亲那时在沙河机场当团长，办个男兵应该问题不大。但父亲说，你结婚我可以给你点钱，但你当兵我办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种地。以后侄子在老家盖房子，母亲给他一些钱，算还了父亲的心愿。

“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查来查去，没查出父亲有什么问题。10月5日，母亲到海淀医院上班，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办了学习班。学习班是那时的时髦语言，其实就是拘留了，不让与家里联系。

母亲被一关四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推来推去，最后关在海淀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没人管她了，换饭票也没人管。母亲很想看望我们三个孩子，乘机溜回家。因为没钱买车票，徒步走到南口。海淀卫生局发现母亲失踪了，请示北京市委吴德，说“政治保护”，南口派出所把刚到家的母亲弄走，升了格，关到海淀公安局拘留所。临走，母亲对姥爷、姥姥说：“爸妈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之后母亲“失踪”了，姥姥到处打听也找不到母亲的消息。

母亲被关进拘留所的日子不好过，每天白菜汤窝窝头，睡地铺。这些母亲不在乎，她性格很开朗。但在那种压力下，母亲不敢言声，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再扣上什么罪名。反正已经说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就这样前后关了一年，母亲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时间长了，也揭发不出什么新材料，几经请示，母亲才被放回家。

母亲从拘留所出来时，虽然才30多岁，但面黄肌瘦，头发特别长，我们都不认识她了。母亲在南口姥姥家又闲了三、四年，就这样八年过去了。母亲要求上班，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还是在家休息吧。这时，母亲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姥姥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来，怕她找来找去，再被关进去。姥姥说：“让上班就上班，不让上，家里也能过，就带着孩子过日子吧。”

几经周折，直到1978年9月15日，母亲才重新回海淀医院上班。先安排在北下关门诊部，那里没食堂，工资还不够她一人在外面吃饭。一、两个月后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淀医院，被安排在挂号室。

六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11岁，姐姐12岁，弟弟才刚刚2岁。母亲被抓走了，专案组想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回父亲的老家河北迁安县农村。因为父亲老家没有亲人了，才不得不又把我们送回南口姥姥家。

我姨父王玉琳是南苑机场的飞行员，开飞机送朝鲜代表团去上海参观，正巧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就不让他开飞机了，让他坐火车回北京。之后停飞，被转业到沈阳。姨和姨父把1岁和3岁的两个女儿留在南口姥姥家，加上我们姐弟三人，一共五个小孩。12岁姐姐潘鹭最大，但她因小儿麻痹双腿残疾，11岁的我成了家中的“壮劳力”。家里还有三个大人，姥爷70多岁，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被关了四年，放回家后精神恍惚。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全靠60多岁的姥姥撑着。每天我帮助姥姥洗全家的衣服，小院都晾满了。晚上姥姥把三个小孩子哄睡了，她还要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每天都熬到深夜。

父亲在时，家里经济不发愁。父亲不在了家里就塌了天，特别困难。母亲只有30元工资，姨舅们时不时帮点忙也有限，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爷的一点退休金。家里三个小孩子，吃不起牛奶，姥姥就养了一只羊，挤羊奶。还养鸡、种菜。

我们姐弟也因父亲受牵连，遭遇了很多痛苦。要是父亲在，姐姐潘鹭的腿就治好了。而我当时被国家女篮选上，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政审没通过。弟弟潘鹏是甲级身体，却因为政治问题当不上兵。本来父亲对母亲说，将来孩子们的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我们姐弟三人没有实现父亲的心愿。

七

母亲放出来后非常不服，到处写申诉信。她首先就想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上海，常坐父亲驾驶的飞机。有时宋庆龄指名要父亲担任机长，她在上海还请父亲吃过一顿饭。“九一三事件”前，宋庆龄仍在等父亲送她去上海。所以母亲第一个想到了她。宋庆龄接到母亲的信后，很快派秘书到海淀医院来了解情况，但阴差阳错没见到母亲。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费尔的谈话。因为正值审判“两案”，费尔专门问：“你们是怎样对待‘九一三事件’中的飞行员的？”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林彪）飞行员是个好人。”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句话，鼓起了上访的勇气。

我陪着母亲上访了整整一年，终于拿到父亲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空军34师给我们家落实政策时，母亲提出三条，一是大女儿潘鹭是残疾，安排工作，减轻负担；二是二女儿潘鹭在南口上班，调回城里工作；三是抄家时东西丢了，要折价赔偿。这几条要求西郊机场基本上都答应了。但母亲提出房子问题没有解决。“九一三事件”后，原来分配给父亲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要给母亲西郊机场的房子，母亲不要，她对父亲的死伤透了心，不想再听到飞机声了。

八

父亲自1971年9月13日牺牲后，母亲和我们三个儿女都很想为父亲扫墓，无奈母亲因政治以及身体的原因始终未能成行。父亲最后这次飞行是从北戴河起飞的，于是北戴河就成了母亲的祭拜地。拿到父亲病故通知书以后的每个夏天，我和弟弟潘鹏都要带母亲去北戴河海滨，这是全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2004年8月2日，我们陪母亲从北戴河海滨回来，全家聚餐，庆祝八一建军节。表面上看不出母亲有什么异常，饭后母亲洗了澡，也洗干净了衣服。她最后望了一眼孙子，走到房门前，顺势滑到地上，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这时才知道，母亲每次从北戴河回来，表面上心情很好，但心里悲痛万分。

要说母亲的晚年很幸福。弟弟潘鹏的儿子健康活泼，已经上幼儿园了。弟弟潘鹏是母亲唯一的儿子，因为长期无房，结婚多年却不敢要孩子。直到几年前，我和弟弟同时买了相邻的经济适用房，母亲才盼到孙子。要是父亲健在，看到一大家子人，尤其是看到宝贝孙子，真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可是现在……

我们姐弟三人在母亲老家北京南口的山上为父母建了一座合墓。合墓中只有母亲的骨灰，而代表父亲的，只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以及朋友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捡回的一小块熔化的飞机铝片。

九

父亲冤死41年了，我终于来到埋葬父亲遗骨的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上。我们在蒙古乌兰巴托见到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教授，他认为林彪专机是驻蒙古的苏军打下来的。我们在温都尔汗现场附近见到一家牧民。老牧民告诉我们，中国飞机失事后他到现场看过。听目击者说飞机是先着火，后掉下来的。

父亲飞机的坠毁至今还是一个谜。

坠机地点是一片荒漠，机上九人的合墓已经毫无踪影，只能估摸着是在半山坡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装满鲜花的花篮放在墓前，把酒洒在干燥的土地上，然后我深深地向父亲鞠了三个躬。我在父亲的墓前站了很久。我告诉父亲：您安息吧，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姐弟三家人互相照顾，都生活得很好。不远的将来，我们姐弟还会一起再来看您，并争取把您带回北京南口，和母亲永远团圆。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